

海軍工作四十年之七

廣東軍區司令是個不祥之位

● 楊元忠 (前東南長官公署副參謀長、海軍總部副參謀長、海軍元老)

推都推不掉的職務

一再推辭都辭不掉的粵海軍區的職務

抗日戰爭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時結束。我政府就派人由四川東下，接收日軍及汪精衛政權所留下來的機構及物質。廣東方面的海軍物資，由當時的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上將，派海軍前輩劉永誥少將前去接收。次年初，軍政部海軍署於歸併了陳紹寬將軍的總司令部之後，發覺劉少將的措施有毛病，因為我是廣東人，就要我前去接管。

我這個出生於香港的廣東人，從小就離開家鄉，在北平住了三年多，就考取了東北海軍官校。畢業後就在東北海軍服務，一直到抗日作戰，八年之中，四年是在四川，另外四年則在美國做海軍武官的工

作。因此我對於廣東的瞭解程度，就非常之少。

我在知道要我去接管劉永誥少將的粵越區海軍物資的時候，趕忙去查看有關資料，知道這地區包括廣東全省之外，香港及越南的河內的海軍物資，都要我負責。當時海軍還都南京未久，業務甚繁，而人手尚少，祇許我在京滬一帶的海軍軍官中挑選兩人隨行。我知道廣東官場氣息不佳，我對那邊的海軍人員又不熟識，覺得沒有達成這一任務的把握，就一再懇辭，都沒有辭得掉。幸好恰逢海軍署副署長周憲章少將的海軍同期同學蘇傳雲到南京報到，聽候派職。他戰前就在廣東服務多年，對那邊的「人」與「事」，都很熟識。經我向周副署長一推薦就成功。我方得改去上海接收汪政權的海軍學校；籌辦新制的

海軍軍官學校。

這時海軍署已升為海軍總司令部，陳誠將軍兼任總司令，不久因東北局勢日見緊張，他被調去東北主持那邊的局面，無法兼顧海軍，當局乃派黃埔軍校第一期出身的陸軍中將桂永清，於一九四六年秋，以代總司令的名義主持海軍。

桂總司令到任不久，就召見我。他決定把在上海的海軍軍官學校遷去青島，我則調到海軍總司令部擔任第五署署長，主管海軍各學校的教育，部隊訓練及海軍所有機構的編制與員額的分配。據他的親信說，桂將軍是從陸軍的「教導總隊」起家的，所以他特別重視教育訓練工作。證之他把他所最要提拔的海軍電雷學校第一期出身的王恩華、胡敬端、黎玉璽等人，先後都派到第五署做處長，此言似屬不虛

。這麼看來，他調我做第五署的署長，對我還是善意的。

我在海軍總部做了大約一年的署長，到一九四七年冬，有一天他召我去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駐廣州的海軍第四軍區司令金軼倫代將出了毛病，要我去接任。那時候，我知道駐台北的海軍第三軍區司令黃緒虞少將，因工作環境不順，頗有倦勤之意。黃司令是我在海軍官校就讀時的校長，抗戰時就離開海軍，桂總司令接掌海軍，經我向他推薦，方回海軍服務，與我的關係相當密切。同時我對廣東的工作，早就抱「敬而遠之」的態度，因此我就對桂總司令說：我的階級祇是上校，年資都淺，不敢擔任這一任務，不如把三軍區黃司令與金司令對調，較為簡便。桂總司令同意，但又說，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宋子文先生方面，不容應付，要我陪黃司令一同去廣州，妥為安排。當時我對他後面這一句話完全不懂，但又不便多問，祇好陪黃司令跑一趟廣州。

宋主任在接見我與黃司令的時候，吩咐黃司令先不要到差。我對這一變化覺得很為難。等到送黃司令到他住的旅館之後，立刻再去見宋子文先生，說明金司令非

調開不可，請他再作考慮。他說：既然如此，那就由你接替金司令好了。我說桂總司令本來就有此意，我自覺階級較低，不敢擔此重任，方有改由黃司令來接之舉，我實在不敢就此應允。宋主任說：明天我就要去南京，由我再和桂總司令當面商量好了。到了這個時候，我方明白桂總司令何以一定要我陪黃司令去見宋主任，原來宋主任已經向桂總司令要逼我去接金司令了。

宋子文調任廣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時期，國民政府對中共作戰，已顯相當不利，故甚重視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因此亦重視該地區的海軍，宋子文一到廣州，就注意海軍第四軍區的負責人。經查明我的忠誠及才能都好，又是廣東人，乃向桂永清指調我去擔任海軍第四軍區司令，我推辭不了，祇好去廣州就職。

最難纏的第四軍區

聲名狼藉的海軍第四軍區

我國海軍於一九四七年底，把沿海的防區劃分為四個軍區。第一軍區管轄江蘇、浙江兩省海域。第二軍區管轄山東、河北、遼寧三省海域。第三軍區管轄福建及

台灣兩省海域。第四軍區管轄廣東省（包括海南島）及東沙島海域。實際上第二軍區便是從前東北海軍的地盤；第四軍區是從前廣東海軍的地盤；第一及第三兩個軍區則是從前中央海軍的地盤。

過去廣東省在政治上常常與中央政府貌合神離，而且與香港及越南的河內毗鄰，所以走私情況十分猖獗。影響到地方政府的廉明程度。抗日戰爭結束後，留下來日偽海軍物資相當多，因此亦留下來一個很容易出毛病的包袱。所以海軍第四軍區便成為海軍各一級機構中最難纏的一個。何以見得呢？

從抗日戰爭結束後，開始接收廣東的敵偽海軍設施，到我去接任，祇不過是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就換了四個負責人。第一位是劉永誥少將，他祇做了幾個月，因為出了毛病，被撤職查辦，就不告而別。當時海軍就要我去接任。經我一再堅辭，乃改派蘇傳雲上校去。他做了半年，亦出了大毛病，被初到任的桂總司令槍決。桂隨即派他的江西同鄉海軍上校鄒毅去整頓。鄒祇做了幾個月，亦出了毛病被撤職，改派海軍老前輩金軼倫代將去接。他做了半年多，又因為包庇大規模走私而被扣押

起來，這四個司令，沒有一個能以平安脫身。

我是這個司令部的第五任司令，從一九四八年初，做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方被調去台北，做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誠長官的副參謀長。這一年半多的期間，倒是風平浪靜。不過，在我之後，先是梁序昭少將來接。他到任沒有幾天，桂總司令對他的作風很不放心，改派海軍少將王天池去接。十月中旬廣州就放棄。我走開後一個多月的光陰，又換了兩任主管。從這些風風雨雨的經過看來，海軍第四軍區這個機構令人頭痛的程度，不言可喻。怪不得當我被發表去廣州工作的時候，以世故很深出名的海軍前輩，海總第一署署長董沐曾少將，因為不知道此案的曲折，就對人說，他不曉得我何以要去跳這個「火坑」。海軍第四軍區名聲之壞，由此可見。

循規蹈矩從不貪污

我何以沒有栽跟頭

我擔任海軍第四軍區司令的期間，正是我國近代史上一個十分艱鉅的時期。主要是惡性通貨膨脹，幣制屢更。由關金而金圓券而銀圓券不斷在變，愈變愈是民不

聊生。接著就是京滬危迫，政府南遷廣州，民心士氣日益低落。軍公人員因受惡性通貨膨脹影響，待遇變得十分微薄，多數抱「五日京兆」的心情在混日子。做機關首長的，除了要推行本機關的業務之外，不但要照顧自己的眷屬生活，還要設法應付所負責機關的各種開支。那時候的物價，可以說是天天增漲。而機關的經費雖然亦會調整，但調整一次，少說亦要維持幾個月，跟幾天就漲一倍的物價永遠脫了節。做主官的如果不想辦法去應付，那就連文具、郵資、電報及水電費都沒法支付，勢必關門大吉了。

不少美金。這時候就拿點出來貼補家用，當時美金在廣州市面比港幣還更受歡迎。節省度日，還可維持溫飽。

軍區司令部的經費，則是無從貼補的，祇好另想辦法。當時我所採用的辦法，與其他機構大抵相同，嚴格說起來都是違法的。但是不違法行嗎？祇要把違法得來的款，用來維持業務所需的開支，不中飽、不浪費，就可問心無愧。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誰來追究你違法不呢！

當時那個「違法」行為，還是出自「惡性通貨膨脹」現象上。原來軍區司令部收到海軍總部所發經常費及人員薪金，是隨到隨發，不能耽擱的。至於營造與採購

那個時期的廣州市面，不管政府的法定幣制是甚麼，大小交易都以港幣計算，如以港幣來衡量物質，其通貨膨脹就很合理。因此軍公人員一收到薪金，都趕快拿到市面兌成港幣，否則更要吃苦了，大家都如此，我亦不例外。我的月薪折成港幣，好的時候可有二三十元，壞的時候祇有數元。最壞的一個月，是從金圓券改為銀圓券的前夕，我拿到金圓券的薪金，已經換不了港幣，成為廢紙了。好在我於幾年前在美國華府的駐美大使館做了將近四年的外交官，那時候武官的待遇很高，積存

物資的費用，法令規定要登報招標及開標，然後多半分期發給得標的廠商。從接到款項到支付出去，最少亦在十天以上。這十天以上的光景，港幣的變化就很可能，於是我就把司令部中的「預算與財務」，「總務」，「政工」，「監察」四個部門的主管，及一位我所認為最靠得住的山東籍副官，組成一個五人小組，負責將收到的營造及採購的款，即日兌成港幣。到要付款的時候，方提出相當港幣換為法定幣制去支付。這一買一賣之間，就有相當盈

餘，用來補助司令部的日常業務開支，剩下來就可用來改善司令部人員的生活。

舉例來說，當時廣州民房的租金，一小間起碼要港幣四五十元一個月。而廣州的軍區司令部，我不曉得當初是如何接收的，一所宿舍都沒有。我一家老少三代六人，租了客廳飯廳及三間臥房的一層中等樓房，每月港幣三百元，起初都由我自己付。等到司令部從「違法」手段積存的財力已經相當充裕的時候，就租下廣州市郊一所三層樓的住宅，給司令部人員及眷屬做宿舍，這時候我的宿舍租金，方由司令部的積餘款項支付。除此之外，我從未支用任何款項，我的家用，亦不許總務室的人來照顧。

我到任的時候，盜賣軍用物資的風氣，已經成為陳跡，代之而起的是走私的風氣。大規模的走私，是從香港水路私運禁止入口的奢侈品。小規模的走私，則是夾帶黃金及珍貴首飾入境。我到任後，專幹走私的人物，知道我的作風與前任的主管不同，就不敢再動走海軍門路的腦筋。我對自己的行動，亦採防微杜漸的措施，我每次去香港，不論是公務或私事，回廣州的時候，都坐需經海關檢查的民用交通工

具，從來不坐海軍艦艇，免得被人懷疑我的隨身小提箱裝的是甚麼東西。因此軍區人員之間，就沒有蜚短留長的閒話。後來我到台北，從桂總司令的心腹人員口中，知道當年桂永清曾對他們說：「真奇怪，廣州方面，自從楊司令到差之後，再亦沒有人打小報告來告狀了。」

我之所以能在海軍第四軍區做了約二十個月風平浪靜的主官，其竅門說起來亦很簡單，祇是不偷懶、不大意，尤其是不動腦筋去貪污而已。

終於遠離是非之地

好不容易離開是非之地的廣州

一九四九年三月，國民政府南遷廣州，因此桂總司令常從台灣左營到廣州來。他對我的態度很親切，可見他對我相當信任。六月中旬，桂總司令又到廣州，一見面就對我說：「陳辭公在台北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你願不願意去做他的副參謀長？」我說：「總司令派我去那裏工作，我當然就去那裏。」他見我一口答應去台北工作，似乎有點出乎意外。停了一會便對我說，廣東的局面維持不了多久。派來接任的人，怕不容易進入情況。叫我暫時

不去台北就職，等廣東的工作結束，撤離廣州之後，再去到差。我當然遵命繼續留在廣州。

但是六月底到七月半之間，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以陳長官的名義，先後給我下了三道催促到職的電令。我在桂總司令再到廣州的時候，把這三道電令呈給他看。他想了一陣然後對我說，如果廣州不至於在一個月內放棄，他祇好派人來接我的工作。我便向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將軍及他的主管作戰高級幕僚請教。他們認為中共的部隊還沒有到江西南部的「三南」地帶，絕不可能在一個月內威脅到廣州。桂總司令乃決定派海軍少將梁序昭來接我的工作。這時已是八月中旬了。

我知道梁少將對廣東的情勢並不熟，除了將司令部的業務向他交代清楚之外，並陪他坐軍區的砲艦巡視廣州附近的內河航道一遍，讓他曉得如果將來情況突變，虎門要塞先陷，軍區的艦艇仍能不需經過虎門要塞的「虎口」出海。我方於八月底離開廣州。

我到台北的次日，海軍總部的王天池少將就請我吃飯，向我探詢廣州的情況。我方知道他已奉派要去廣州接管梁司令的

任務。這突如其來的更動，使我吃了一驚。我實在想不到梁司令接任還不到一個月，廣州的局勢又日見危迫，為何又要換人？後來纔知道，梁少將到任後，知道軍區司令部積存了不少公積金。便經常在外請客、應酬，他和當時的參謀次長吳石，是福州同鄉，交往更為熱絡，被桂總司令派駐廣州的耳目報了上去。桂對梁這樣活動十分不滿，便把他撤換了。

廣州是十月十四日放棄的，距我離開廣州不到兩個月。算起來，梁、王兩人，每人祇做了個把月的軍區司令而已。

官場文化耐人尋味

跳出「火坑」陷入「泥淖」

這裏所說的「火坑」是指海軍第四軍區司令的職務。我從這一職務調去台北做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副參謀長，怎會是陷入「泥淖」呢？

官場中的勾心鬥角，常常是很微妙的，不是當事人便不容易察覺。這個政治泥淖在發展的初期，連我自己都沒有警覺到，事後把逐漸獲得的資料加以分析，方才明白「原來如此。」

桂總司令在廣州問我願意不願意去台

北做陳辭公的副參謀長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便表示願意去。當時我的想法，覺得我的現職是海軍一級單位主管，而長官公署的副參謀長職位則是幕僚。他以前調我到廣州工作，是從幕僚調做主管，我曾經辭過。如今不在乎調任幕僚，正可表示我的態度前後一致。如果表示猶豫，怕他會懷疑我是捨不得放棄軍區司令的好處。但是我這一表示，便種下了他對我的猜疑的種子。因為事後我方知道這一遷調，不是出自桂總司令本意，而是陳辭公主動向他要調我的。桂總司令當然早就知道，我是以前陳辭公接管海軍之初，所選五個主要助手之一，他知道宋子文先生要調我去廣州做主官，我都不肯就。陳辭公調我去做幕僚，我倒一口氣答應了。他便認為我與陳辭公的關係，超過我與他的關係。天曉得，我與陳辭公那裏會有甚麼關係？陳辭公之所以選用我，與宋子文先生之指名調我相同，大概都是由於他人推薦。至於陳辭公對我的賞識，那是我到台北以後的事了。

從此以後，桂總司令漸漸加深他對我的疑忌。這是他因為有了成見，便易受海軍中一些好搬弄是非的人所煽惑的結果。

這些人一再向他說：「楊某人搭上了陳誠的路線，他不會再買總司令的賬了。」他竟深信不疑。這裏面當然亦有些因素給這些人作藉口。其一，我到台北就職後，陳長官每次出遠門，都要我隨行，作為他的助手。他從未帶過「陸」「空」軍副參謀長，因而給那些人作藉口。其二，海軍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出了兩次用大型登陸艦從香港運了大批呢絨入台灣的「走私」案，被立監兩院向政府提出質問。陳辭公大概對桂總司令作了相當的指責與警告。這些人便乘機在桂總司令面前埋怨我不幫海軍的忙。桂總司令從我在海軍第四軍區司令任內杜絕了走私的作風看來，認為我一定反對海軍走私，對這些閒話當然相信。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桂總司令被調離開海軍，我都被調到國防部做個坐冷板凳的「戰略委員」。到馬紀壯做海軍總司令為止，我之所謂陷入「泥淖」，就指的是這一階段的工作。我在海軍第四軍區司令任內，雖然風平浪靜地做了一年半，然後平安調升。但是不久就「陷入泥淖」。而這「泥淖」還是種因於我做第四軍區司令任內。可見海軍第四軍區司令這個職務，真是一個不祥之位。